贵州在古代是兵家不争之地?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全省面积的90%以上,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片遍布喀斯特峰林、溶洞和峡谷的土地,在古代文人笔下是“瘴疠之乡”,在中原王朝眼中更是“化外之地”。俗语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有很多人戏称,贵州这地方在古代是妥妥的“兵家不争之地”。

但若翻开史书细看,我们不禁要打个问号,贵州的军事价值真就只配得到一句“不争之地”的评价吗?

为何“不争”?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地势崎岖,是岩溶化高原山地,且地形被河流切割得极为破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写道:

“山势如犬牙交错,马不能行,人须攀藤附葛。”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机动性和后勤能力均受地形影响,贵州这种“地无三里平”的地形(喀斯特地貌),蜿蜒曲折的山脉、深谷、河流,都使得大规模军队行军难,补给更难,对古代军队来说堪称灾难。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主力从四川入云南,却避开贵州腹地,只因“牂牁(zāng kē)道险,粮运不继”。《平播全书》记载,明代平定播州之役时,24万明军翻越娄山关,粮草全靠民夫肩挑背扛,“运粮一石,费银十两”——听起来就挺费劲的。

再来说说“天无三日晴”。贵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复杂,多阴雨天气。古代贵州森林密布,加之湿热多雨,导致瘴气(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横行。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

“黔处万山丛谷中,地穷而气,……大抵黔地气候不齐,一日之间,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稍一不慎,易生疾疹。”

外来军队难以适应这种“谜一样”的气候,而且疫病肆虐也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唐代时,安南(今越南北部)一带的战事就屡因气候和疾病导致唐军折损惨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贵州。在明朝平定西南的过程中,驻扎贵州的明军常因水土不服和疫病困扰而进展缓慢。林则徐途经贵州时,也曾哀叹:

“士卒病亡者十之三四,非战之罪,实天亡之。”

众所周知,古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经济中心。当时贵州经济较为落后,加之气候地形的限制,农业生产有限,粮食供应困难,不仅难以支撑大规模军队长期作战,而且就算打下来了也没饭吃。这对于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的中央军队而言是致命的。

直到明代,贵州仍是“刀耕火种,不通牛耕”,中原王朝即便占领此地,也需从湖广运粮供养驻军,成本极高。

从“不争”到“必守”

但这并不意味着贵州毫无军事价值。贵州的地形气候是障碍不假,但利用好了也可以成为一道很好的防御屏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南方抗击元军时,曾考虑利用西南山地作为抵抗蒙古铁骑的屏障;明朝平定西南时,贵州的山地同样成为防守与游击战的有利地形。

因此,贵州虽难以成为大规模进攻的前线,但在防御战中却不失为一块天然的军事要塞。贵州很少被“争”,但始终被“守”。

而且,贵州虽非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却是本地土司的生死战场。

统治播州(今遵义)700年的杨氏土司,曾建起亚洲最坚固的山地城堡——海龙屯。2015年海龙屯遗址申遗成功,考古学家发现其城墙厚达6米,箭垛、瓮城、暗道一应俱全,堪称“山地军事建筑奇迹”。掌控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巅峰时期拥兵可达十万,《明史》称其“雄长诸蛮”。吴三桂剿灭水西时,甚至需要动用象兵和火器营。

1600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明,万历皇帝调集24万大军,耗银200万两,血战114天攻破海龙屯。此战被视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凸显了贵州地区的军事重要性。杨应龙凭借山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倒逼明军发明“云梯车”“火龙炮”等特种装备,属实是促进科技发展了。战后贵州设遵义、平越二府,但《明神宗实录》称:“平播之费,十年赋税不能偿。”明神宗表示:这很难评。

明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贵州逐渐被纳入全国治理体系,明清之际,贵州成为平定西南叛乱的重要战场。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势力盘踞西南,贵州成为南明流亡政权的最后据点之一,也说明了贵州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从“边缘”到“枢纽”

从历史长河来看,贵州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枢纽的演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远离中原战乱,的确并非兵家必争之地。但到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重视、改土归流的推进,贵州成为西南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近现代,贵州的战略地位更是显著提升。贵州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节点。1935年,红军在贵州境内进行战略转移,利用地形四次突破围剿。遵义会议的选址,正是看中贵州“易守难攻”的特性。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方向,也使贵州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进攻华东、华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贵阳、遵义等地均成为军事要地。贵州的“险山恶水”变成天然屏障,保护了内迁的工厂、学校。1944年日军发动“黔南事变”,因山高路绝,机械化部队机动困难,最终止步独山。

抗战时期的黔桂铁路更是发挥了重要的运输和保障职能。此外,贵州的溶洞还改造为战备仓库。

2016年,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落户贵州平塘,恰因FAST需要直径500米的巨型“锅形”结构,而贵州喀斯特地貌区天然形成的洼地(如大窝凼)形状与望远镜所需的凹坑高度契合,能够大幅减少人工开挖量。再加上贵州人口密度低,群山环抱,能有效隔绝电磁波影响——当年阻挡军队的天险,如今守护着人们探索宇宙的梦想。

由此可见,贵州在一些历史时期确实不是兵家争夺的焦点,但其军事地位却不容忽视。贵州虽非传统军事核心地带,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在不同时期承担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如今我们站在海龙屯废墟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杨应龙刻在石壁上的楹联:

“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屯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这份狂傲,印证了贵州绝非无足轻重——它只是在等待属于它的时代。

西洲(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光阴

大唐“孤勇者”:死守西域飞地

在我国广袤的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名字,虽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唐朝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年少时因“倾慕班超之志”,投笔从戎,远赴西域,在那里挥洒热血,建功立业。安史之乱后,唐朝在西域兵力空虚,吐蕃趁势而入,河、陇相继失守,西州沦为“飞地”。李重晖为国坚守故土,在西州依旧施行唐朝年号、职官及丧葬制度,维护着唐朝对西域的统治。李重晖以一颗赤诚之心,在西域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追慕班超名门子

202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火焰山镇的巴达木东墓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3座唐代墓葬,其中编号M16的墓葬为双室墓。

在我国古代,墓室规模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级别。根据目前的研究,唐代官员只有达到二品以上,其墓葬才可使用双室墓。因此,使用双室墓的通常为皇室成员或功勋之臣。

在这座墓葬的后室,考古人员发现了墓志,题为“唐故西州都督府长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共刻有19行楷书,合计580字。通过对墓志的初步释读,考古人员确定了墓主人为唐代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并从墓志中了解到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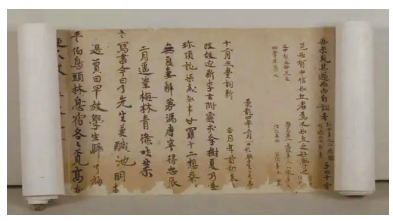
李重晖祖上原居辽东,后迁至陇西地区,逐渐发展成关陇贵族中的一员。李氏家族在隋唐之际中诞生过很多仕途显赫的成员,如隋梁州总管李宽、唐义成节度使李澄等。李重晖的祖父李檀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赠尚书左仆射”,并受封为“敦煌公”;父亲李谨担任“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其堂兄更是在唐德宗时期官居宰相、权倾一时的名臣李泌。神龙二年(706),李重晖出生,深厚的家族背景让他一出生便站在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享受着富裕优渥的生活。

然而,自年少时起,李重晖的内心就从未满足于这些世俗的繁华。他不但聪慧好学,饱读诗书,而且对历史上那些英雄豪杰的故事十分向往,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东汉名将班超,即墓志所称的“倾慕班超之志”。

因此,尽管家族的光环足以让李重晖在长安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他却决然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道路——远赴西域,追寻自己的梦想。这份勇气和决心,在那个讲究门第出身、追求安逸享乐的时代,难能可贵。

投身西域心许国

李重晖担任的首个职务就是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户曹参军主要负责掌管户籍、田赋、仓库等事务,需要具备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政务能力。面对堆积如山的户籍档案文书,他不辞辛劳,逐一核对信息,纠正了许多错漏之处,使得瓜州的户籍管理更加规范有序。在负责田赋征收时,他深入乡间地头,了解百姓的实际情况,既确保了国家税收的足额征收,又避免了过度征收给百姓带来负担。



古墓出土的唐代吐鲁番小学生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玄注》。

来源/吐鲁番博物馆

凭借在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任上的显著政绩,李重晖迎来了仕途上最重要的一次升迁——担任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西州,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唐朝在西域设立的重要行政区域。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击败高昌麴氏王朝,以其地置西昌州,不久改名西州,治所在高昌城(今吐鲁番市高昌故城)。西州地扼天山南北孔道,位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其下辖五县,交河县正是其中之一。

此后,李重晖又升迁为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负责掌管都督府内的文书簿籍、审查案件等事务。李重晖在新的岗位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书管理制度,使得公文的收发、存档和查阅更加便捷高效。在审查案件时,他认真细致,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确保每一个案件都能得到公正的处理。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李重晖最终登上了西州都督府长史的高位。长史是西州都督府的高级官员,地位仅次于都督,主管户籍管理、文书往来、民政事务等重要工作,肩负着保障西州稳定和政令施行的重任。至此,李重晖已经达到了自己仕途的顶峰。

火焰山下有孤忠

在李重晖等唐朝良吏的治理下,西州一片欣欣向荣,并与大唐长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密切交往、交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为了平定叛乱,唐朝不得不从西域抽调大量兵力回援内地,导致西域兵力空虚。吐蕃趁虚而入,迅速占领了河西、陇右等地,切断了西州与唐中央朝廷的联系,使其沦为一块孤悬于塞外的“飞地”。

虽然与朝廷失去联系,但李重晖始终坚信,朝廷不会放弃西域。艰难的岁月里,李重晖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才能和智慧,组织西州军民加强城防建设,储备粮食和物资,抵御吐蕃的进攻。他积极联络周边其他势力,争取支持和援助。在他的带领下,西州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敌,使得吐蕃始终未能轻易攻破西州。

坚守西州的同时,李重晖还努力维持着唐朝的各项制度在西州的施行。他严格按照唐朝年号纪年,遵循唐朝官制任命官员,并按照唐朝的丧葬制度办理丧事。这些看似琐碎平常的举动有着深刻的意义,不仅体现了西州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忠诚和认同,也向世人表明,即使身处绝境,西州依然是大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贞元五年(789),李重晖在西州都督府长史的任上去世,享年83岁。年号不仅是纪年方式,更是中央政府制度在各地能够施行的体现。他的墓志称其卒于“贞元五年十二月九日”,表明西州即使在李重晖去世后、孤立无援的绝境下,仍奉行唐中央政府的年号,坚守唐朝正朔。从墓志中“权窆(biǎn)”一词可以看出,李重晖的家人原本只是打算把他暂时安葬在火焰山脚下,等到能与中原取得联系时,再迁回故乡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安葬。然而,李重晖去世后不久,西州最终还是被吐蕃攻破,他的遗愿也未能实现。

李重晖的事迹和精神永远留在了西域土地上,成为人们心中的一座丰碑。

韩靖宇(摘自《国家人文历史》)